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当代文坛](#)

## 杨菁长篇小说《在埃及说分手》评论

【作者】牛玉秋 等


2008年11月6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主办的杨菁长篇小说《在埃及说分手》新书发布会与研讨会在北京草场地艺术区都亚特画廊举行。会议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查振科主持。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作品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并且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与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李敬泽、李建军、陈福民、王干、叶梅、牛玉秋、吴秉杰、于青、傅谨、萧立军、胡平、丁道希、王山、陈松叶、张洪宇、李恩祥、沈梅、王珺等。


牛玉秋:


首先觉得《在埃及说分手》确实是一本小说。我们作为专业读小说的人,读过很多让人痛苦难受的小说,但杨菁的《在埃及说分手》是一部读起来让人愉悦、处于欣赏状态的小说,同时这部小说又非常有价值。作品讲述了一个结束与分手的情爱故事。一般的爱情故事常常是这样结束的:于是公主和王子结婚了,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在埃及说分手》却反其道而行之,叙述了一个结束于分手的爱情故事。结束于幸福美满通常是对某种价值准则的肯定,结束于分崩离析通常是对某种价值准则的批判与否定。当然,任何批判与否定都能左右价值观的坐标与准则。那么,《在埃及说分手》否定的是什么?肯定的是什么?从表层看,这部小说具有浓烈的时尚与世俗色彩,女主人公秦小曼和她的几个女朋友都是时尚中人,从事时尚职业,穿名牌衣物,出入酒吧、饭店。秦小曼一开始选择的人生道路也是遵循流行的价值规范,她集美女、淑女于一身,这样一个女性形象的塑造,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意义的集中体现,这种对女性从外在感观到气质修养再到贞操的全面而苛刻的要求,正是男性中心文化的具体体现。对于女性的这种要求在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是司空见惯、发人深思的,在中国社会倡导男女平等近60年,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这种陈腐落后的观点却以凶猛之势再度成为流行的社会价值观念。我曾经看过这样的小说,女主人公凭着对这种价值观念的服从和顺应,获得了惊人的价值财富和美满的婚姻,然而在这种价值观念下她们的爱情能幸福、婚姻能美满吗?集美女淑女于一身的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中的真实地位到底如何?小说冷静地解开了华丽外表下丑陋的真相。《在埃及说分手》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把女人当成男人的附属品,而是让秦小曼在婚后富足而空虚的生活中,形成了她独立、自主的性格,并最终走向了与男性中心文化决裂的道路。在流行的生活场景中挑战流行的价值观念,是《在埃及说分手》这部小说独特的价值所在。


吴秉杰:


《在埃及说分手》是一部很单纯知性的小说,它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作为长篇小说可以向故事性思维发展,篇幅越长对作家的故事性思维要求越高,通过故事形成一个人物关系,然后不断深入、不断创新。这部小说感情非常充沛,人物刻画鲜活,给人印象很深。比如说费元元,一个作家;还有集美女淑女于一身的秦小曼。如果要向故事性方面发展,我认为它可以写成一部比较极致的小说,但是杨菁没这样写。《在埃及说分手》人物关系不复杂,感情基调开始就确立,感情丰富。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并没有往故事方面发展,它的知性就在于,这是某一个社会阶层某一个文化群落的一种精神表达。在小说中的两个正面的男性非常重要,一个是“何以”,这个“何以”,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何以”带有一丝神秘色彩,一个冷兵器一样的男人,是女性心目中的男子汉形象。第二个男人叫罗硕夫,他对她在船上说的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也是整部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能抛开权力和金钱的话,生活会变得很简单。”看到这里我就想,这确实是一部知性小


 收藏文章

 打印文章

 关闭本页

 发表评论

 阅读量[94]

 评论数[0]

说，非常理想化。我们怎么能抛得开权力和金钱呢？我们的生活怎么能简单？权力的力，如果是这个“权利”的“利”的话，我们更无法抛开了！这个“权利”是一定要保证的，一定要维护的。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由权力来决定人类生活的年代，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一句话。第二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看了小说后觉得这里边确实存在一种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问题。她为什么以埃及为背景？我觉得她是需要人类文化精神的一个成果作为支撑，所以认为，喝了尼罗河的水我就不会忘记埃及了，我就不会忘记我们人类有这么一个文明的传统。当我看到《在埃及说分手》时，书的名字我都没读懂，为什么是在埃及说分手？现在我明白了，她要开始一种新的人生，要抛开权力和金钱，这让小说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而另一个角度却说我们没法抛开，因为这部小说是知性的、理想性的一种表现。《在埃及说分手》应该是作者在埃及生活的经历，埃及的每一个景观都让她平移到了作品中。她选取的国际背景不是物质生活的东西，而是要把国外的文明和现代化的一种精神作为背景，所以这部小说在精神程度上还是有一定意义和追求的。

于 青：

一口气看完小说，在“80后”之前的写作前辈里，能有这么一部好玩、好看、轻松、融合了很多时尚元素的小说，非常令人惊喜。这说明“80后”的写作方式我们也能写，但是我们能写的“80后”不见得能写。看了《在埃及说分手》后，感觉小说中有一种“柔”在杨菁身上是很少见到的，而且女性气息在小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我所认识的作者本人来看，从她的写作修养到她的人生经历经验，这些都不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尤其对杨菁来讲，她生活中经历了很多磨炼，应该说她的人生经验比一般女性都要老到些。用这样一种比较轻松的旅游的方式来衬托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娜拉出走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对她来说应该是驾轻就熟的。这部小说对杨菁来讲只是一桶水里的一小部分，并没有运用她的人生经验和文学储藏的大部分，虽然比起前部小说来更好看了，但还是能感觉到，杨菁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比前部作品用更多的力，或者她是在一种比较愉悦的状态下写这本小说的。从作品角度来说，每个人看作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的感觉是新瓶装旧酒，虽然旧酒的成分变了，从前可能是白酒现在是红葡萄酒了，但是，爱情这个元素无论什么时代大致都是一样的。也许小说里娜拉出走的故事有点老套，但是因为里边有时尚元素，主人公的文化背景与作者蕴涵的人生经历，使这部爱情故事有了立体感、丰富感。虽然说爱情的结局是一样的，但是过程和细节给人带来了不同的魅力。

胡 平：

小说写得很浪漫，从人物名字就透视出了作者的情调。杨菁是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浪漫主义者。前半部分就表现出了作者的创作趋势，作品是典型女性写作，男性化更趋向于情节，而女性化更趋向于心绪心理。小说主要写的是女性心理，是一部女性色彩非常强的作品。主题虽然比较普通，但是作者将之推向了极致。作品中秦小曼和苏玮是当下的极品女人和极品男人，但是这样的人也出现了婚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考虑到普通人婚变的可能性将更高。到埃及说分手似乎是为了得到一点什么，可是作者没有从这方面着手，最后问题也没有解决。但是现实就是如此，问题不一定非要解决。这个题材的处理并不简单，两性间的理解各有不同，很多女性并不认为欲望对她们的爱情有很大影响。上世纪80年代人也有自己的爱情观，跟五六十年代人们的观念不同，但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根本改变。书中罗硕夫和秦小曼的关系写得很好，打破了作品过于单纯的调子。两人似乎暧昧的关系，让秦小曼这个人物变成了一个并不完全传统的女性。何以并没有经常出现，常出现的是罗硕夫，这点处理得很好，写出了传统女性的另一种现代色彩。但是秦小曼的爱情也并不是完全传统的，她也有自己的欲望。当初她和苏玮的结合就是欲望化时代的产物，二者各有所求，掺杂权力和物质的因素，因此秦小曼不能完全责怪苏玮。真正的爱情还是发生在穷人中，当然也不是说富人中完全没有爱情，但是很少。秦小曼和苏玮的爱情本来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作者应该将夫妻间的紧张关系深入描写，增加一点复杂性。

叶 梅：

杨菁从事文学创作是从30年前开始的。读完《在埃及说分手》以后，我对她的看法又有了很多改变，感觉她应该是个很深刻、很痛苦的人。她的痛苦不是个人的，而是对这个时代对整个文化充满了忧思，我觉得《在埃及说分手》是一部深刻的书。作者所描写的故事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但是却渗透着作者痛彻肺腑的感受，对当下时代文明的拷问。书中写到：“神的伟大的缺失”，现在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神的伟大的缺失的时代，这种深深的危机感浸入字里行间。作者认为当下文明已经到了非常令人忧虑的时刻，而女性角度的关于女性的文化和道德的评判更让人忧虑。还有一句

话：现在的这个文明……她说“现在”，而非“现代”，“现在的文明是让女性吃亏的文明”，这话是痛彻肺腑的。作者所讲述的四个女性的故事有一些比较表面化，但那种感受与其说是四个人的感受，不如说是一个人的感受，女性的感受。而女性的感受在当下文明的状态中是一个吃亏的感受。你甚至做好了当装饰品的准备，但是你连做装饰品的保险和安全可能都不具备。秦小曼完全准备好了做装饰品的心理准备，但即使是这样她仍没做好将要面临危险的心理准备，实际上是没有安全感。作家通过这本书对此方面的思考是非常深刻和耐人寻味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究竟缺失了什么？问题出在哪里？表面看起来是女性问题实际上牵扯的问题非常复杂。作者一直在思考，但最终还是没有给自己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罗硕夫一直是作为解惑者的形象出现，虽然他的解惑是非常苍白无力的，但是提出来的问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对多种文化的比较，作者有意地把叙述背景放在埃及，埃及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代表了目前残存的宝贵的文明之一。这个文明究竟意味什么？作家在这里有很多描述，和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中国当下的文化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使人产生联想的东西，作家一直在不断地追寻。无论是对中国作家，还是中国目前的文坛来说都有一个思考，那就是如何运用世界眼光。比方说，我们现在还处在农业大国的背景下写作，我们的思考还是一种农业思考，但是中国现在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了。杨菁在这里作了一个探索和尝试，虽然说对两种文化的比较或者说探索已经非常的成熟、天衣无缝了，但是在这里还是有让人感觉生硬的地方。实际上她是在做一种比较，她用这样一种角度，这样一种姿态，把中国古老的和时尚的，过去的和当下的文化与人类其他的文化文物做一种比较，这是作家有意识要做的探索，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简单的埃及风光和风情的描述。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是想写一本好玩的好看的书。这是纯文学怎样去贴近大众、怎样真正的成为一种读物，而非象牙塔里的喃喃自语所作的一种尝试。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去写这样一本好玩好看的书？我认为，她是想把自己的写作姿态进一步放到读者中去，让小说真正地成为一种读物，而不是作者自我欣赏的东西，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也就是说，纯文学怎样在边缘化的状态下走进洪流之中，走进市场大潮中，这是对纯文学多年来的一种考验一种挑战。虽然至今没有找到非常好的通道，但我觉得杨菁是在做这样一种思考。

李敬泽：

一进屋就发现一帮中年人在谈论爱情，这简直就是个观念艺术行为。我在想为什么要在埃及说分手，而不是在门头沟说分手，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事。

因为在门头沟说不出分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受到世界观的影响，有时候在叙述中都不能够抵抗和质疑现实的强大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定要到埃及或欧洲去才有可能说出来，才会有一个转身的余地，才可能重新对生活作出选择，向往一下重新选择生活的可能性。所以《在埃及说分手》这本书的写法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唤起性，但同时它也在反面表明了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人的根本性的某种体系，所以说中国的小说面对各种可能性。有时我们过度焦灼，过度和现实逼近，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丧失了想像的能力，这时就需要插上翅膀，才能更有力地反抗现实，和现实中拘谨和限制我们的东西产生对抗。

关于欲望和人生意义在作品中体现的力量不是很大，我感兴趣的是书中的异国背景，这是我们当今生活的一部分，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让自我意识逐步精细化、逐步完善。尤其是“80后”的写作，可以说是文学创作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现在中国人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确立自己的定位，这本身就是精细化的过程。在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对一些时尚与非时尚元素进行一种毫无道理的分级，但我认为，那些非时尚元素或许会更真实。尽管杨菁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但是我很欣赏她对生活一视同仁的态度。现在人们缺乏的就是对丰富繁杂生活的强烈胃口，当代作家要善于消化和处理庞杂的生活经验，这是非常稀少和珍贵的能力。我对草场地艺术区充满惊奇，尤其是都亚特画廊。草场地艺术区把都市的边缘化和艺术的前卫性非常好地融合在一起，实际上艺术性和时尚化往往是不能分开的，杨菁就很好地把时尚元素传奇化地运用到了小说中，反映出了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

王 干：

我认为，这部小说是“50后”挑战“80后”的一部小说。“80后”能写的我们“50后”能不能写？我们“50后”能写的，“80后”能不能写？看到小说的第一感受就是，“80后”的东西我们也能写，但是我们“50后”的东西“70后、80后”或者写不出来。这部小说基本上是用时尚元素包装起来的追问古老问题的问题小说，这是我的定位。什么问题呢？追问爱情。首先，在时空上，作者把空间放在国外，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讨论爱情问题；其次，在时间上，各种时间切面交汇在一起；再次，通过四个女性不同的命运来思考问题。爱情问题是非常古老的文学主题，传统思考爱情是为了追求纯洁、真正的爱情。而她更多地是提出了对于爱情的追问，因为爱情首先是要有男有女才有爱情，

男女在性别当中出于什么比例，如何配置，怎样组合，作者不仅是要讲述一个女权主义问题，而且还把爱情的追问放到性别问题上进行思考。性别问题、爱情问题……并且继续到了人类的精神价值。由于精神的匮乏缺失，导致爱情的软弱和苍白缺陷，没有精神支柱爱情就变成了欲望。杨菁的《在埃及说分手》这部小说，站在时尚的角度，从性的问题谈到了精神，最后谈到了信仰。就题目来说，选择埃及是非常有深意的，作者把爱情放到文化的背景中进行思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问题小说。她只需要提出疑问，为什么？而不是解决问题，怎么办？上世纪50年代的人写80年代的时尚中间仍有断层，但也说明了作者的心态非常年轻。“80后”只思考怎么生活而不思考为什么生活，这是两者间最不一样的地方，每代人的思想和思考方式都不一样。

李建军：

杨菁的这部小说可读性很强。是一部关于幸福、平等、尊严和出路的小小说。作者试图探讨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精神问题与精神危机，也就是“怎么办”的问题。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对它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漠然置之，不去思考也不去回答它。我最近写了一系列文章研究俄罗斯文学，这是因为俄罗斯文学密切地关注着社会问题和时代痛苦，总是向生活发出尖锐的质疑，向人们提出“怎么办”的问题，充满一种寻求答案的激情。我们这个社会正处在复杂的转型期，属于一个成长中的不成熟的社会，因此，文学应该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痛苦，发现社会的问题，从而帮助人们惊醒、觉醒，走向成熟。回过来看杨菁的这部小说，便可以发现，作者是怀着深深的焦虑和痛苦，来探察当代人精神世界存在的严重危机。例如，现在，人们物质生活日渐富足，但内心却少了幸福感，或者说，幸福指数较低。小说作者只有关注人的忧郁和苦难，快乐和幸福，才可能写出伟大的小说。如果仅仅描写人的欲望，仅仅停留在对“口腔期”的“恋污癖”的描写，或者，仅仅去调侃一通，那样耍弄小聪明，而不是怀着深深的焦虑和疗救的愿望表现人们的内心生活，那么，这部小说是不可能打动读者，也不可能有生命力的。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个人主义成了时代价值体系的一个支点。个人的存在无疑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空间，但是，更应该有超越个人之上的东西，只有在超越个人的利他主义的价值体系建立起来，稳定的信仰基础确立起来的时候，一个社会才是健全的，才有可能持久和谐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脆弱的社会，很容易把物质上的富有异化为堕落的条件。小说中的人物费元元援引一个外国分析家的话说：“中国的穷人从来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人，而中国的富人却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力量。”古代讲“为富不仁”，中国人的价值平衡结构没有建立起来，这与小说探讨的信仰问题是有关的。作者提出了这个痛苦的问题，并且从多方面试图回答了这个问题。尤其是信仰若被以虚假的名义或消极的方式过度利用时，信仰就失去了它的公信力，失去了它的力量感。

所以，一方面，中国社会物质的丰富、经济的发展很重要；另一方面，重建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任务也很迫切、很艰难。而在这个时候，有幸读到杨菁的这部作品，就有种阅读上世纪80年代作品的感受。小说里边不仅仅写了中产阶级的体验和中产阶级女性的苦闷，而且也写到了中国社会巨大而潜在的被灰色帷幕遮盖的部分。特权阶层人物骄奢淫逸、腐败堕落的生活，在杨菁的笔下，只是露出了冰山之一角，也只不过是隐隐约约的方式来写，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另外一种生活的恣睢和糜烂，已经能够感受到作者充满正义感的不满和抗议。小说中所描写的当下社会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包涵了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阐释。这部小说虽然还有许多美中不足的问题，但是它所表现出的正气和勇气，却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陈福民：

拿到小说我冒出个疑问：为什么在埃及说分手？从题目看无疑是一个很时尚的小说。为什么不是在中国农村说分手？似乎是钻牛角尖的提问。但我想说的是《在埃及说分手》带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各种眼花缭乱、时尚、灿烂、绚丽的背后又隐藏着空虚腐朽的各种元素，在这样一个大杂烩时代里，又孕育着生机。杨菁的小说通过描写四个女性人物不同的遭遇，提出了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即空虚与时代的问题，作者通过这样一个载体衬托出了人生的意义所在。不论到了什么时代，人生的意义问题还是会落在每个人身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追问，是很辛苦也是徒劳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和人生的意义就是建立在这种徒劳的追求上。杨菁虽然用了很多时尚的元素，但还是让我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方舟》，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追寻什么？有没有意义？这是一个老话题。

这是在21世纪对20世纪80年代老问题、并且是不可能结束的问题的一个重新思考，还是有关精神和欲望的象征性的质询。我们是不可能回避欲望的，今天这个时代是欲望的时代，欲望被抬到很高的指数，不论我们生活多么富足，欲望是不会满足的，潜藏的欲望是怎样被这个时代所归顺、引导的，

这是一个时代问题。杨菁用这样一个时尚的好看的小说去思考质疑这些问题，不论是伟大的爱情还是卑微的欲望，杨菁写出了我们的一个底线，无论你是高尚的、标榜伟大的、阴暗的，她都写到了，这是很难得的。

萧立军：

小说很有新意。上世纪80年代杨菁就创作了小说《滴泪泉》，表现出了很好的文学创造力，语言优美，有很强的小说调度能力，写起来从容不迫。《在埃及说分手》这部小说保持了她的艺术特色。每年出版的小说有一千多部，但能够让人看下去的很少。这本书写的是女性婚姻的情和爱，通过时尚华丽的生活形式表现了物质时代人们的精神层面的茫然感。我当时给杨菁出了一个“饿”主意，希望她在出版量非常大的现在这个社会里，能够写一本让人很想看又具有颠覆精神的书，希望她寻找到一个震撼点，但不是很到位。

中国社会30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家也肯定受到了很大影响。但要把这种生活体验写到小说中是比较困难的，大多数作家的创作态度还不够严肃。希望杨菁在今后的创作中保持年轻的心态和探索精神，找到好T台之后，还要找到有冲击力的创作素材，然后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傅 谨：

这是很有意思的爱情小说。但要是细想，这又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我把它看成是“觉悟”小说，非常有意义、非常独特。独特有意义在于埃及的古老、神秘、纯粹、简单。这种古老、神秘、纯粹、简单为小说提供了一个背景。如果仅仅写这几个方面而不是为了主人公出逃的需要，这个背景也可以放到西藏。如果放在西藏，小说也会很好看。为什么会想到西藏？小说的最后让我想到杨菁跟我说过一个故事，一个朋友独自一人到西藏旅游，背着满腹的问题心事跑到寺庙，跟一个小喇嘛倾诉内心的苦痛。小喇嘛一直默默听着，最后轻轻说了一句话：“佛说：放下”，她听完后泪流满面。每次想到这个“佛说：放下”的故事我都会心有余悸。杨菁的这部小说也在说“放下”，怎样放下世俗生活中这些本来以为很重要的、摆脱不了的东西。可是小说如果仅仅在说一般意义下的“放下”，那它就不会感动人了。我认为“放下”不是虚无，不是完全的空虚。如果“放下”就意味虚无就意味空虚，那么人生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另外一个人物秦小曼的丈夫苏玮他也放下了，他什么都能放得下，可恰恰就是因为他太放得下了，因此苏玮在小说中成为了一个其实很没意义的人。秦小曼之所以让人心动就是因为她能放下所有别的东西，惟独放不下的就是爱情。像作者这样能热爱生活相信爱情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才能塑造出秦小曼这样的人物形象。她慢慢悟到所有生活中的这些荣华富贵都是身外之物，惟有心灵里那一点东西放不下，那就是爱情，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追求。这样一个人她可以放下所有别的东西，惟独放不下的就是她要追求的人生与生活。小说里秦小曼有自己的欲望，当她心里边真正的需求在何以那里被唤醒时，这才恰恰是让她感动让她觉得无比珍贵的东西。我老是在想这部小说“觉悟”的是什么？“觉悟”就是放下可以放下的、应该放下的东西，同时保持自己对自己的一份真心，相信自己，知道自己应该得到什么，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心中应该有这样一种信念存在。埃及这个地方在小说里有着独特价值，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埃及说分手》真正值得我们细心去品读、细心去咀嚼的地方正是这种“觉悟”。如果要区分一个上世纪50年代的人与“80后”的作品不同之处，那就是写出了这种对人生的“觉悟”，只有真正经历了这种生活的沧桑之后才能感受得到。

杨 菁：

非常感谢大家的发言。有一点我想强调，我们老说“50后”“80后”，能不能不要刻意把这个差距拉大。我每年都在不断地看学生的作品，从“60后”看到“90后”，我和学生们沟通得很好，并没有那么多的障碍。人类有一些永恒的东西，是和年龄没有关系的。早生30年晚生30年能改变我们基本的东西吗？包括对时尚的看法。常年和学生在一起，沉浸在年轻的心态中，这大概就是我对生活的感悟和在写作中可以跨越年龄和代沟的原因之一。关于信仰，有一句话我以前看过，印象深刻，“西方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中国是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目前中国就是这个状况。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国家，也去了埃及，在到处旅行游访的过程中，我想我们的生活真的就只能这样吗？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方式？我们的“教堂”在哪里？当然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思考，我们这一代人，这种思考已经融入血液中，剥离不出去了。

（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郑飞、戏文系本科生张夏菁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  
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  
校的语文教研室，19

更多  
加盟  
信息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 [www.literature.org.cn](http://www.literature.org.cn) [www.literature.net.cn](http://www.literature.net.cn) E-Mail: [wenxue@cass.org.cn](mailto: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